

# 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价值

陈楷基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要:**文化遗产是不同文明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记忆载体,反映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具有超越主权民族国家范畴的价值意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实践日趋活跃,文化遗产对外合作走上系统化、制度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这一转变有赖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引。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必将积极践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内核的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中华文明治理观念与实践的价值,努力构建契合“全球南方”利益的跨国治理合作新机制,为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提供极具世界意义的全球文化遗产治理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全球文明倡议;文化遗产外交;文化遗产;全球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5)03-0050-13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5.03.005

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淬炼而传承不绝,创造了大量今天仍然被继承与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遗产。截至 2024 年,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已达 59 项。它们标示了中华文明是其所是的独特存在价值,彰显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品格,为人类文明的深广度和多样性做出了卓绝贡献。因此,加强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播,建设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与当代实践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夯实新时代民族精神独立自主之基,贡献中国之治渊博雅正之道,既是坚定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的“必答题”。近年来,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本国文化软实力在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中的作用,期望就承载人类文化根脉的文化遗产,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以解决相关领域争议,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合作。提出文化遗产外交概念的学者蒂姆·温特(Tim Winter)指出,文化遗产的非人类行为体属性,将文化遗产外交定义为超

越特定文化形式投射,更多聚焦于双向和多方位的文化互动,需要被传递共享文化的外交行动所激活,并形成一個跨国、跨领域甚至包含硬权力形式而高度政治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以实现国家间共享文化和自然历史记忆并构建相关领域交流合作治理形式的目标<sup>[1]</sup>。中国学者徐莹则给出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即文化遗产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作为主要参与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同推动、目的在于“促进各国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合作及协同治理的外交行为”<sup>[2]</sup>。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对外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但达到体系化、制度化实践程度的文化遗产外交还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中国文化遗产国际互动不断加深,对外合作质量不断提高,逐步深化的对外遗产交流合作实践亟待系统科学理论指引。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收稿日期:2025-02-09

作者简介:陈楷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经济外交。

基金项目:外交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 A 类重点项目“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外交实践与策略研究”。

所彰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兼顾各国现代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致力于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宏伟目标, 给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四大实现路径<sup>[1]</sup>, 为人类现代化理论探索提供了文明维度的理论指引, 为推动以文明包容互鉴为价值取向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智慧, 为繁荣以文化和而不同为互动旨归的人类文明百花园谱写中国答卷, 也为包括文化遗产外交在内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 是指导文化遗产外交持续推进的纲领性行动指南。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智识资源的文化样态呈现和文化实践产品, 蕴含着特定时空之下人类对普遍文化意义的思考, 具有超越主权民族国家范畴的价值意涵, 反映了不同文明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与多样性。文化遗产外交作为一国对外呈现其文明核心要素与历史文化特质的展示窗口, 承担着传递该国对于国内治理与世界秩序认知演进的哲学、历史和文化观念的现实载体功能, 具有历史记忆溯源的符号象征作用, 为全人类所共享, 是承载文明记忆的全球文化公共产品。

文化公共产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公共产品, 不仅符合公共产品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等特征, 而且也具备传递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 其供给过程浸润着鲜明的文化价值属性和意识形态导向。国际文化公共产品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管辖边界的跨国文化公共产品, 既需要凝聚全人类团结合作的共识, 也需要克服供给方意愿不足的障碍, 起到反映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作用, 促进形成公正普惠的世界文化遗产治理机制。

### 一、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生成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文明传承和对外交流, 秉持和合大同的兼济精神, 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乃至世界文明贡献了众多促进人类文明赓续的基础性文化公共产品, 为各国文化遗产存续提供了适当载体, 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 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系统总结新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等, 促进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为推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为优化我国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提供世界镜鉴, 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国际文化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关怀决定了为世界提供优质文化公共产品有其必然的内生逻辑。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力量对比处在深刻调整时期, 各国为了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占据先机而激烈博弈。在世界维持总体和平的情形下, 区域热点问题与地区局部冲突仍时有发生, 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既有全球文化合作应对机制力不能逮。群体性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全球文化治理机制更加公正普惠的呼声不断增长。复杂多样的全球治理难题也外溢到世界文化遗产合作领域, “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 世界局势演变愈发变乱交织, 全球治理挑战愈发矛盾尖锐, 就越需要一种能够凝心聚力、团结世界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路径, 拨清利益纷争迷雾, 看清文明演进趋势, 塑造全球友好合作大势。全球文明倡议指导下的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可谓正当其时。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原则, 不断学习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 并结合我国文化遗产存续现状与特点, 形成了一套较为实用、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在此之上, 我国积极履行世界文化遗产大国责任, 尽己所能帮助有关国家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与时俱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 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合作前提, 双边文化遗产援助与多边文化遗产治理并重, 形成了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实践项目。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已有成功实践, 也为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提供了生动的实践逻辑。

### (一)内生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遵循原则与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的战略选择,蕴含着对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与科学洞见。推动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建设,就是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彰显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也理应辩证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要以精神文化财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持久精神力量。在不断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博采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因文明多样而精彩,文明间差异不应也不会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障碍。作为承载文明传承的文化载体,各国文化遗产最为直观可感地反映了各国的文明价值追求与精神内核。中国对外文明交流需要一个可以直接传递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善意的切入点。通过运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积累的技术与经验,以文化遗产保护交流为核心任务的文化遗产外交不仅帮助合作伙伴保护和传承其文明,而且也通过参与其他国家器物遗产的保护过程,汲取世界文明多样和合的精髓,促使其成为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精神资源。由器至道,道器不离,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秉持器道不分的原则,在保护有形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掘、弘扬其背后孕育的无形文化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兼顾中华文明赓续的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对外开放的内在意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也要在开放中搞建设,承载文化国际交流又兼具道器双重属性的文化遗产外交必然生逢其时。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经磨难,深知和平发展助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深刻道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自身文化基因、历史传统和制度特性做出的必然选择。历史上西方国家依靠暴力殖民与掠夺财富从而推动本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

来了深重苦难,而且也造成了西方世界工业化完成后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甚至可以说,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往往可以追溯于此。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选择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永远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不走“国强必霸”的狭隘小路,也不奉行“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将中国自身发展命运与世界和平紧密相连,谋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工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sup>[4]</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是开展合作、实现互利互惠的先决条件。各国人民只有用友好的理念、友好的情谊凝聚起来,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心愿。”<sup>[5]</sup>一个民族往往对自身过往璀璨的文明心向往之,而作为标示其历史道路的象征,文化遗产承载着珍贵的文明信息和民族自豪感。帮助其他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帮助他国保护其文明尊严和历史独特性。文化遗产外交是构建相互信任、展现平等相待、传递人民友好最为直接、有效的互动方式。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石的全球文明倡议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立足丰富人类精神世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初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路径,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文化遗产现代化保护传承之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关怀奠定了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思想底色和服务宗旨。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感滋养,依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展现了借鉴先进、尊重多样、批判吸收的文明关怀<sup>[6]</sup>。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廓清了坚持文化自主性的历史向度,而且也为中华文明当代崭新形态厘定了高擎文明包容性的开放旗帜。文化遗产外交因其成己达人的文化互助本色,成为呈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意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载体。习近平主席向 2023 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时指出:“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中国将更好发挥北京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sup>[7]</sup>在科学论断中华民族文明特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实践导向,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规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为媒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共促世界文明繁荣进步。

尊重文明多样性、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也为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提供了宏阔的思想指引。“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sup>[5][46]</sup>谋划长远的文明交流实践需要真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只有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交流互鉴、国际协作,世界各国方能超越不同发展阶段与文明隔阂,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交流塑造共识。文化遗产凝聚人类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共识,在此共识之上,文化遗产外交起到共享、发扬文化遗产对于地区和全球文明共同价值的促进作用<sup>[8]</sup>。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必须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外交的积极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采取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态度,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不分高低优劣,唯有文明之间摒弃门户之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博采众长,才能携手促进人类文明百花园的繁荣,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幸福世界。全球文明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落实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球公共产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指明了服务宗旨与工作方向。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相关工作的原则,文化遗产外交实践要以宽广的历史视野,理解不同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的认识,探索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的相处之道。作为促进文明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发挥着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当代价值的重任。中国文化遗产外交要在交流合作实践中,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承担者。文明交流互鉴的最佳载体是人,深化各国人文交流互动是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与各国民心相亲的重要途径<sup>[9]</sup>。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也契合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要求,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拓展交流合作内容与渠道<sup>[3]</sup>。全球文明倡议指引下的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符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内在逻辑。

## (二)外需逻辑

全球权力格局变动凸显了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全球文化治理根基薄弱的困境。西方对外战略习惯于从实力地位、地缘竞争等视角考察世界并指导其对外政策实践,“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展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思维<sup>[10]</sup>。西方片面地将全球文明标准窄化为西方价值观,以自定标准审视世界其他文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由其提供的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也聚焦于能够促进西方政治价值观传播的领域。而在弥合全球教育技能鸿沟、促进不同文明沟通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西方做得远远不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多次退出全球文化合作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拖欠应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费,干扰到了该组织一些项目的正常运转。由此可见,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缺位、失衡与失灵现象突出。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世界文化遗产治理与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声的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建立能够体现自身文明实践传统和贴合自身发展阶段实际的全球文化公共治理及公共产品供给有着迫切需求。发展中国家既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也有保护本土性实践知识的需求,这样才能均衡反映世界文明多样性。面对无法独自解决的全球性文化治理与文化财产存续的难题,“全球南方”国家也亟须能帮助其成功应对挑战的国际文化公共产品与治理机制,而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难以承担促进不同文明人文相通的重任。

随着数字产业带来技术革新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趋势,新兴行为体不断涌现,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方出现多样化趋势,西方大国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的权力呈现流散态势。

第一,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主导方——西方世界,在主持文化公共产品供给、分配的合法性方面遭到削弱。西方各国内部公众意见极化和族群文化撕裂,使得其在全球范围履行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极大限制,传统上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文化供给机制呈现部分功能失灵,所能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同时,西方世界文明固有的“中心—边缘”观念分野与西方世界内部价值多元化进程,也使得非西方世界质疑既有全球文化治理机制以及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全球南方”呼吁构建更加包容普惠新型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声音越发显著。

第二,全球文化公共产品需求的专业化和地域化特征不断加强,专业领域中的国际多边合作成为目前较为有效的治理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对外呈现着权威且高度专业化的形象。随着全球文化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或独立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边专门合作机制也逐渐增多。近年来,由法国、阿联酋发起成立的“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成为全球文化遗产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新兴文化遗产合作平台。这些专门化治理机制以及组织机构在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个人、非官方组织和机构的作用被不断放大,甚至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新主体。有影响力的个人借助社交媒体等数字时代的意见平台随时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并通过数字平台提供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聘请有影响力的杰出个人作为其特定事务形象大使。同时,非官方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也在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深度参与了埃及与中国敦煌相关文化遗产修复保护工作,法国远东学院在参与柬埔寨文物古迹保护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sup>[1]</sup>。

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也受到全球治

理难题跨区域、跨领域弥散的影响,呈现议题交融趋势,使传统上就事论事的全球治理思维难以适应新形势。目前,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受到安全、经济、气候变化以及观念冲突等跨国治理问题影响,看似无关全球文化治理的其他领域难题往往与文化治理有着复杂的关联性,“黑天鹅”效应显著。

首先,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常态化、复杂化,严重影响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博弈逐渐激烈的大国关系以及成因复杂且爆发频率相对增高的不同规模的区域冲突上。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需要国际秩序呈现整体稳定态势,营造一个利于全球文化交流的国际环境。否则,国际人文合作交流的共有观念会逐步泡沫化并走向瓦解,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价值基础就此受到严重动摇,该机制会从全球公共产品退化为区域乃至小集团公共产品。而大国关系的激烈博弈也会加剧区域冲突爆发频率,区域冲突会直接妨碍该地区获得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能力以及破坏该区域生产、展示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能力。激烈的地区武装冲突也会造成大量的文化遗产损失,相关国际组织难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职能<sup>[2]</sup>,而展示人类文明智慧、构成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文化财产遭到不可逆破坏。这些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制度威信和供给通畅。

其次,全球经济治理也对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能力。经济表现的波动会制约流向文化领域的公共和私人资金量,更遑论为超越主权民族国家范畴、展示人类文明意义的全球文化公共产品投入更多资金。对于文化遗产领域而言,走私贩卖文物遗产也多是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人们无正当生计出路,并且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缺乏所致。

再次,全球气候变化等新型全球治理问题也对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威胁供给安全。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为例,作为展示人类文明价值理念的物质传承载体,文化遗产保护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因素影响越来越显著,甚至直接威胁到遗产存续安全。例如,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长期气候

暖湿化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构成了极大挑战,这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文化遗产遭受气候变迁问题影响而亟待解决的案例<sup>[13]</sup>。

最后,观念的分歧也造成了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窘境。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文化治理机制与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照顾其特殊性,能够体现“全球南方”的本土实践,超越文明隔阂,既能体现文化供给多样性,又能捍卫各国文化主权与安全。而发达国家则强调以自身文明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和国际规则,往往以监督者形象对“全球南方”的文化本土实践加以评判。这种深刻的观念分歧也割裂了本就脆弱的全球文化治理机制,使得世界文化遗产治理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遭到削弱。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窘困现实呼吁一种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的新型全球文化治理思路和公共产品。

### (三)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文化遗产合作实践为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肇创了基本形式。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兼顾社会效益与学术价值,坚持进出结合的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文化遗产援外国际合作主要采取品牌保护项目、人员专技分享、智力咨询支持等方式,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追随者逐步向引领者转变。此时,双边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是主要的交流形式。1961年中国专家余鸣谦和李竹君带领25名建筑修复工人完成了蒙古国兴仁寺和博格达汗宫维修工程,这是中国首次援助蒙古国古建筑维修工作<sup>[14]</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合作日渐频繁,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也步入蓬勃发展时期。文物援外保护工程范围和规模逐步扩大,积极开展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吴哥古迹国际协调委员会框架下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行动最早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sup>[15]</sup>。1998年,中国援建的周萨神庙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并成立中国援柬吴哥保护工作队,开启了中国对柬埔寨文化遗产保护二十多年的援助历程<sup>[11]</sup>。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文化遗产保护技术飞速发展,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遗产合作深化了全球文

明倡议下我国文化遗产外交的实践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也步入了文化遗产对外合作的黄金期,援外文物保护工程推进力度大,投入资金多,所涉区域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sup>[15]</sup>。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遗产合作实践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体系化、制度化完善:

一是增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重要外事活动能力,持续推进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也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中国援助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等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不断取得进展,启动援助缅甸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强化面向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文物保护与合作考古项目,为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带来了良好声誉<sup>[16]</sup>。二是构建多元立体的对外文物交流合作机制。中国文化遗产对外合作形成了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合作相协调的立体格局,在加大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方面,持续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推动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调查,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sup>[17]</sup>。统筹实施中外双边联合申遗、联合考古项目,打造了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国际论坛及遗产展览。三是引领世界文化遗产治理工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治理,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其治理机制改革、完善。中国两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附属委员会委员国,与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续签合作协议并落实相关成果,深度参与“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管理工作<sup>[18]</sup>。落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倡议,中国召开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sup>[19]</sup>。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由学习者、追随者转变为倡导者、引领者。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实践方式与能力的转变要求中国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提质升级,构建并实施更为制度化、专门化的中国文化遗产对外战略行动。

## 二、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下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追本溯源,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如

今成就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行动实践上做到了“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地位。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凝聚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历史经验，又深度契合“全球南方”文化自主发展需求的新型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为人类文明治理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原创性方案。该倡议集中反映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航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者——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人类现代化探索经验以及人类文明演化治乱兴衰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思考。全球文明倡议基于以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中国国情与世界经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做到了有机结合，惠及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兼济天下，以包容、和平、合作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促进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共同、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文明传承模式与现代化发展道路之间的互学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塑造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与重要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同全球文明交流实践创造性结合的新型全球文化公共产品。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观规定了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实践要义，全球文明倡议与文化遗产外交也有着内在理论逻辑与外在实践意义上的紧密联系，这决定了文化遗产外交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当然构成部分。

(一) 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精神内核的全球文明倡议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新创造性成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化理论，又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以辩证处理自主性与开放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之间关系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着眼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涵与民族特性，融通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内外之别的界限，既保持、巩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又积极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文明百花园的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因此，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国际意义上看，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如何进行国际文化实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思想创新与理论外延。全球文明倡议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内核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历史趋势的科学判断，深刻把握全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继承、发展的辩证关系，为构建交流融合的全球文明治理新形态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人文基础<sup>[20]</sup>。全球文明倡议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理路和思维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贯通古今中西文化的时空之别，以宏阔的文明历史视角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守护历史淬炼之根，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百家文明之长，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中华文明繁荣的理论与实践新使命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感。这种针对不同文化扬弃中继承、吸收中改造的包容胸怀和能动转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给予全球文明倡议等指导对外文明交流互鉴原则纲领和行动实践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方法启示。

建设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sup>[21]</sup>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离不开传承文明深邃哲思的物质载体——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sup>[22]</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了“七个着力”的工作要求<sup>[23]</sup>，其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赓续中华文脉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化遗产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历史脉络的优秀文明资源,通过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对内标识中华民族独特文明发展道路,增强中华文明凝聚力、感召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外传播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展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中华民族文明观,向世界清晰传递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理论成果和行动纲领——全球文明倡议必然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和理论意涵。文化遗产外交作为承接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中华文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载体以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行动桥梁,将会持续推动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建设,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精神。习近平主席在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愿在联盟框架下,同亚洲各国携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sup>[22]</sup>在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更紧密合作,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促进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合作,助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23]</sup>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保障,也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传递的平等、包容、互鉴文明观的旗舰级对外合作项目。

## (二)彰显中华文明治理观念与实践的历史贡献与文化价值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成果,全球文明倡议必然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气质。2018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十个坚持”,并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内涵,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外交指导理论<sup>[24]</sup>。习近平外交思想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借鉴,展现出浓厚的中华文明世界观与价值观底色。而中

国文化遗产外交作为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意涵、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历史纵深的重要领域,也必然体现着别具特色的中华文明观精神意蕴与文化气质。

这首先体现在指导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价值遵循和观念方法上。面对国内外复杂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文化遗产外交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与发展,居安思危,以“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的忧患意识,采古人治水之思,因地制宜,疏堵结合,明断风险源并“对症下药”处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迹诉说着华夏大地文明交通、商贾鼎盛之胜景,今日之中国坚持守正创新文明交流之道,这片古老土地已经成为在开放包容中坚守文化主体性而赓续民族精神的中国,创造出了独具中国文化风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秉持“天下大同”“四海一家”“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在开放包容中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重大主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浸润着和为贵的精神气质,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尚和合,求大同等历史智慧推动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敦煌莫高窟所呈现的多元文明和合汇聚缔造了不朽的人类文明传奇,新时代中国传承这种和合共生的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文明情怀,共建“一带一路”,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共产党以海纳百川之宽阔胸襟,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引领中国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展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是彰显中华文明交往之道与治理理念的生动实践。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立足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在服务双边多边大国外交、促进双边多边文化交流合作、扩大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

方面取得一系列硕果,其中蕴含着中国文明治理观念与实践的思想意义值得总结。

大国是国际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相较于其他行为体,大国肩负着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构建国际公共治理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责任。大国之间应当摒弃零和思维,抱着不同文明相互欣赏的态度,协调彼此政策差异,从而达成双方共赢的合作方案。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积极作为,抓住国际合作的关键“棋眼”——大国文化遗产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取得了一批可观可感的合作成果。作为世界政治与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与法国都有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天然需求。近年来,中法两国元首进行了数次互访,两国元首从战略高度出发多次强调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并签署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协议,以采取一致行动落实有关成果,代表性范例是中法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巴黎圣母院修复和秦始皇陵兵马俑保护研究开展合作以及中法共同参与创建“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基金”<sup>[25]</sup>。中国与意大利等西方文化遗产大国保持深度合作,同美国就中国流失文物追索与打击文化遗产犯罪方面的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同发展中大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同样硕果累累。中国与伊朗、沙特、中亚等国签署文化遗产合作协议,中沙塞林港、中埃孟图神庙等项目已成为中国文物援外标杆项目,持续推进同埃及、南非、伊朗等国联合考古项目合作<sup>[26]</sup>。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化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超越认知隔阂、加深文明理解、促进文明欣赏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sup>[27]</sup>。作为承载人类文明情感的载体,文化遗产在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双边多边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理应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秉持文明互鉴初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完善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文化治理国际制度框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中国已同 17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了 33 项文物援助项目,形成了柬埔寨吴哥窟、尼泊尔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缅甸蒲甘震后受损佛塔、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

遗产保护修复合作项目<sup>[28]</sup>。中国积极推进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国际合作也在稳步推进。自 1985 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四度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两次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主办 2004 年第 28 届和 2021 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深度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管理等工作,积极探索世界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灾后遗产重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等方面的实践,为世界遗产项目和相关缔约国提供技术合作与支持<sup>[29]</sup>。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倡议,中国与柬埔寨等亚洲 10 国共同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搭建了新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与对话平台<sup>[30]</sup>。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而厚重的思想积淀与文明魅力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守文化自主性的底气之所在。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心怀“国之大事”,致力于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影响力,依托中华文化遗产这一文明载体,在中华文化遗产传播实践与文化遗产外交工作作风等方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经验。站在中华文明史所馈赠的丰厚遗产上,中国文化遗产外交要讲好中国文化遗产故事,积极促进世界人民更好读懂中华文化,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谱写当代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新风采。

文化遗产展览交流是发挥文化遗产物化文明载体作用的最好形式,形成一批对外文化传播大展品牌,打响中华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2023 年,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的“何以文明”大展走进联合国总部及五大洲 8 个国家和地区,以数字化的沉浸式体验引领观众走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汇集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84 件精美文物,诉说古代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也展示中外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丰硕成果<sup>[26]</sup>。文物援外项目与中外联合考古是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重要形式,展现了当代中国心怀世界文明、勇担大国责任的形象。中国文化遗产外交持续推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

文化遗产合作项目,以“传帮带”精神“授人以渔”,勇担发展中文化遗产大国责任,在国际多边场合发出负责任文化遗产大国的声音。

(三)助力构建公平正义、均衡普惠的跨国文化治理合作新机制

中国文化遗产外交致力于构建公平正义、均衡普惠的跨国文化治理议题新机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国际实践途径。“全球南方”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保存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外交不仅仅限于文物援外,也包含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博物馆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往往牵涉跨国问题,文化遗产全球治理机制应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利益。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治失序后牵扯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划界使得古代关联文化财产变成跨国文化遗产保护,这就需要跨国议题治理合作新机制加以解决。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参与联盟工作并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以文明互鉴的宽阔胸襟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期跟踪参与联盟科学委员会工作,为濒危遗产保护提供专业意见,成为全球“国际文物避难所”之一,为濒危文化遗产提供安全庇护。在全球文明倡议指引下,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建立了政府间文化遗产专业性合作交流机制与对话平台,搭建了亚洲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国际合作机制。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通过开放申报,对联盟框架下的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文物展览展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交流、公众宣传等项目进行资助和支持,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运作及相关工作提供支撑。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承担负责任文明大国的历史担当。文化遗产外交也是留住人类历史根脉、促进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sup>[31]</sup>习近平总书记对鼓浪屿申遗成功的重要指示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外交不仅要文化遗产“走出去”,也要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先进经验“引进来”,促进中国文

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另一方面,中国引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并不断创新,为“全球南方”文化遗产治理与合作提供技术和智识支持。中国文化遗产外交主要在以下四方面重塑世界文化遗产标准:

第一,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坚持保护为先,因地制宜,适度开发,以合理利用、开发文化遗产来反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是穿越时空的人类文明遗迹资源,其不可再生之历史记忆承载者的角色决定了文化遗产哪怕遭受最为轻微的破坏,也会使其蕴含的人类文化历史价值遭受不可逆的损伤。因此,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原则性问题。面对城市现代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这对看似不可破解的继承与创新的矛盾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sup>[32]</sup>。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推动的正定古城、良渚遗址等文化遗产综合治理范例充分彰显了兼顾保护与开发之间动态平衡的科学理念,在坚持保护为先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既要超越机械保护与无度利用的迷思,在严格执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的基础上,合理展示、利用文化遗产,适度依托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传承文明遗产,也要兼顾现代文明发展,取得二者之间最大的效益平衡,这是对“全球南方”乃至世界文化遗产治理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践行文化遗产援外项目的指导理念。

第二,利用新兴数字技术保护文化遗产。随着数字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文化与科技融合助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进一步深化,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更为立体丰富,活化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可虚拟、易复制的特性决定了其对文化遗产的呈现方式可以接触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而不必受制于文化遗产本体保存状态。数字文化产品独有的产品逻辑为文化遗产遗迹赋予全新的文化遗产展示样态和潜在发掘空间,这样的优势能为文化遗产数字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更好的技术条件与更为高效的保护载体。中国在数字技术遗产保护传承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敦煌莫高窟数字遗产保护便是成功范例。敦煌研究院较早启

动数字技术保护莫高窟项目并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推出“数字敦煌”线上平台,永久保留石窟艺术,实现保护与传播相协调的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目标<sup>[33]</sup>。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走出了一条世界遗产数字化保护之路,这是对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保护与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的有益探索,也对广大面临相似文化遗产保护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极具借鉴意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遗产保护管理、数据库建设进行深度合作,并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的“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缅甸若开邦妙乌古城申遗提供技术指导<sup>[34]</sup>。2024年5月13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ISO/TC 349)正式在北京成立,ISO/TC 349是世界首个致力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国际标准技术专门机构,主要开展文化遗产监测、评估、保护修复过程中术语、技术、材料和装备的国际化工作<sup>[35]</sup>。中国在数字技术保护遗产方面的技术与经验也随着对外文化遗产保护援助项目走向世界,助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迈向数字化时代。

第三,融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界限,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与人才建设制度。文化遗产不仅是有形物质载体样态存世,更以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习俗、语言、工艺等活的形式加以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sup>[22]</sup>。坚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重,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重点合作项目。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传承创新的关键在人与制度,人才队伍建设与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教育机构高层次人才培养愈发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涉外培训成为中国文化遗产外交的重要形式。长城保护条例修订、大运河文化遗产等遗产综合保护立法工作稳步推进。与亚洲国家商签协议开展技术合作、开展专业人员培训,与巴基斯坦等国合作举办线上石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高级研修班<sup>[36]</sup>。上述相

关经验为“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完整系统的方法论与实践方式。

第四,强调文化遗产传承责任与历史正义,健全并实践文化遗产追索返还机制。近代历史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文明遗产国家饱受西方列强系统性的文化遗产劫掠。这种通过非正义、非道德方式促使文化遗产离开原属国的行径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原生样态,造成了大量关键的文化遗产历史信息丢失,损害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主权与财产。在国际法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伸张追索返还的合法权利成为实现其历史正义与文化权利的必由之路。中国积极推动海外流失文化遗产追索返还国际制度性合作,探索通过外交斡旋、司法合作、友好协商、文物捐赠等多种有效途径追索流失文化遗产并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3年,与我国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议的国家达到26个<sup>[37]</sup>。先后推进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劫掠文物溯源研究、敦煌流失文物数字化复原以及实现部分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地的项目,推动国际法学界研讨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返还追索问题<sup>[38]</sup>。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也将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纳入联盟跨国交流合作的目标之中,并先后于2014年与2024年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和《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致力于团结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主的文化遗产流失国协力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合作,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sup>[38]</sup>。

### 三、结语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不仅重视赓续自身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也十分注重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多样包容、交流互鉴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镕铸出一种能够催化中华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明互鉴观,打造出一套能够促进不同文明群己合一、共生共进的文明治理观。以万物并育、和合共生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决定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文化遗产治理公共产品是对传统西方中心文明观的超越和对既有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扬弃,必然不同于以“文明优越”

“文明冲突”为预设图景的西方文明观及其塑造的全球文化公共产品。

中国文化遗产外交践行提供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初心使命,从内在理论逻辑与外在实践形式上,不断对标全球文明倡议要求,通过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中国的文化遗产全球治理话语和叙事体系,促进不同文明间平等交流互鉴,并通过不懈外交实践使其成为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构成部分,为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提供一套迥异于西方中心文明观的世界文化遗产治理方案。

[责任编辑 侯玉花]

#### 参考文献:

- [1] Winter T. Heritage Diplomac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5, 21(10): 997-1015.
- [2] 徐莹. 国际援助视域下的文化遗产外交: 表象、实质与启示 [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22, 6(02): 82-97+157-158.
- [3]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03-16(02).
-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5]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05, 416.
- [6] 吴红斌. 习近平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三个维度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1-08(01).
- [7] 习近平向 2023 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 [N]. 人民日报, 2023-09-15(01).
- [8] 闫昱良, 彭雪, 王翊贇. 文化遗产外交与国际交流合作略论 [J]. 中国文化遗产, 2024(06): 105-111.
- [9] 卢静. 全球文明倡议: 理念与行动 [J]. 人民论坛, 2023(11): 84-88.
- [10] 刘建超. 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关系 [N]. 人民日报, 2023-08-08(09).
- [11] 刘曙光.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物对外交流 [J].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7, 2(06): 5-11.
- [12] 莫莽菲. 加沙上百处文化遗址受损,《海牙公约》效力有限 巴以冲突下的文化财产之殇 [N]. 工人日报, 2024-05-23(08).
- [13] 刘栋. “气变”的威胁: 西北文物保护面临新挑战 [EB/OL]. (2023-09-26)[2024-07-0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60939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609396).
- [14] 李竹君. 亲历 1960 年代援助蒙古国维修古建筑 [J]. 中国文化遗产, 2010(05): 108-111.
- [15] 刘志娟, 王元林. 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国际合作纪实 [J]. 中国文化遗产, 2020(05): 4-11.
- [16]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2017 年工作要点 [EB/OL]. (2017-02-04)[2024-11-11]. [http://www.ncha.gov.cn/art/2017/2/4/art\\_2237\\_33611.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17/2/4/art_2237_33611.html).
- [17]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2016 年工作要点 [EB/OL]. (2016-02-02)[2024-11-11]. [http://www.ncha.gov.cn/art/2016/2/2/art\\_2237\\_33610.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16/2/2/art_2237_33610.html).
- [18]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2019 年工作要点 [EB/OL]. (2019-02-01) [2024-11-11]. [http://www.ncha.gov.cn/art/2019/2/8/art\\_2237\\_24168.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19/2/8/art_2237_24168.html).
- [19]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文物局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EB/OL]. (2021-01-27)[2024-11-11]. [http://www.ncha.gov.cn/art/2021/1/27/art\\_2237\\_44376.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21/1/27/art_2237_44376.html).
- [20] 曲青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N]. 人民日报, 2024-06-13(09).
- [2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17).
- [22]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J]. 求是, 2024(08).
- [23]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N]. 人民日报, 2023-10-09(01).
- [24] 郭树勇, 舒伟超. 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11): 4-28+160-161.
- [25] 徐秀丽. 谱写中法传统友谊的新篇章——中法签署关于巴黎圣母院修复和秦始皇陵兵马俑保护研究合作的联合声明 [EB/OL]. (2019-11-06) [2024-08-11]. [http://www.ncha.gov.cn/art/2019/11/6/art\\_1019\\_157351.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19/11/6/art_1019_157351.html).
- [26] 杨亚鹏.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B/OL]. (2024-02-06)[2024-08-11]. [http://www.ncha.gov.cn/art/2024/2/6/art\\_722\\_186996.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24/2/6/art_722_186996.html).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9-230.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EB/OL]. (2021-01-10)[2024-08-11].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t20220704\\_130669.html](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t20220704_130669.html).
- [29] 吕舟. 世界遗产保护与合作中的中国贡献 [N]. 人民日报, 2023-11-19(07).
- [30] 李群. 守护亚洲文化遗产进行时 [N]. 光明日报, 2021-11-10(16).
- [31] 姜潇, 包显涵, 许雪毅.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2-05-30(01).
- [32] 周玮, 王鹏, 徐壮.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九 [N].

- 人民日报,2024-01-31(02).
- [33]杜若飞.基于数字技术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以敦煌莫高窟为例[J].科技与创新,2022(01):114-117.
- [34]李瑞,徐秀丽.让文明之花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绽放 [EB/OL]. (2021-10-29) [2024-08-13].[http://www.ncha.gov.cn/art/2021/10/29/art\\_722\\_171587.html](http://www.ncha.gov.cn/art/2021/10/29/art_722_171587.html).
- [35]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EB/OL]. (2024-05-15) [2024-11-12].[https://www.sac.gov.cn/xw/bzhd/art/2024/art\\_4d8e336fc3b846088ec160d51e6ba5fa.html](https://www.sac.gov.cn/xw/bzhd/art/2024/art_4d8e336fc3b846088ec160d51e6ba5fa.html).
- [36]施雨岑.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成果综述[N].光明日报,2023-04-25(03).
- [37]徐秀丽.云程发轫 鹏程万里——2023年文物工作回眸[N].中国文物报,2024-01-09(02).
- [38]“殖民背景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国际研讨会”在青召开[N].青岛日报,2024-06-21(01).

##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iplomacy under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hen Kaij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arrier of cultural memory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 regions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ms and having value connotations beyond the scope of sovereign nation-stat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iplom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has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system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chieved a series of fruitful results. This transformation depends on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the new era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will actively practic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with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s its core,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governance, and strive to build a new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that meets the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South", to provide a global cultural heritage governance solution for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South".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ultural heritage diplomacy; cultural heritage; global public goods